

四库全书 术数类集成

郑志斌 主编

六壬术



『六壬术』是用阴阳五行占卜吉凶的一种方法。六壬与遁甲、太乙合称三式。五行以水为首，十天干中的壬、癸分别为阳水、阴水，壬申、壬午、壬辰、壬寅、壬子、壬戌，称为六壬。

大众文艺出版社

六壬术

肆

四库全书 术数类集成

郑志斌 主编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四库全书术数类集成/郑志斌主编.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
1999.4(2009.10 重印)

ISBN 978 - 7 - 80094 - 357 - 7

I. 四… II. 郑… III. 术数 - 中国 - 选集
IV. B9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11059 号

书 名 四库全书术数类集成
编 者 郑志斌
责任编辑 门书文
装帧设计 周世荣
出版发行 大众文艺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84040746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 100009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集惠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307
字 数 450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10 月修订版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80.00 元(全二十卷)

目 录

六壬大全

六壬大全卷一	(3)
六壬大全卷二	(32)
六壬大全卷三	(58)
六壬大全卷四	(91)
六壬大全卷五	(99)
六壬大全卷六	(127)
六壬大全卷七	(154)
六壬大全卷八	(181)
六壬大全卷九	(209)
六壬大全卷十	(236)

皇极经世书

皇极经世书卷之一	(271)
皇极经世书卷之二	(344)
皇极经世书卷之三	(392)
皇极经世书卷之四	(447)
皇极经世书卷之五	(489)
皇极经世书卷之六	(504)
皇极经世书卷之七上	(518)
皇极经世书卷之七下	(538)

皇极经世书解

皇极经世书解书意	(557)
皇极经世书解卷首上	(558)
皇极经世书解卷首下	(571)
皇极经世书解卷一	(589)
皇极经世书解卷二	(595)
皇极经世书解卷三	(624)

皇极经世书解卷四 (650)

皇极经世书解卷五 (667)

皇极经世书解卷六 (685)

皇极经世书解卷七 (695)

皇极经世书解卷八 (709)

皇极经世书解卷九 (721)

皇极经世书解卷十 (741)

皇极经世书解卷十一 (756)

皇极经世书解卷十二 (773)

皇极经世书解卷十三 (785)

皇极经世观物外篇衍义

皇极经世观物外篇衍义卷一 (799)

皇极经世观物外篇衍义卷二 (813)

皇极经世观物外篇衍义卷三 (825)

皇极经世观物外篇衍义卷四 (838)

皇极经世观物外篇衍义卷五 (850)

皇极经世观物外篇衍义卷六 (860)

皇极经世观物外篇衍义卷七 (871)

皇极经世观物外篇衍义卷八 (881)

皇极经世观物外篇衍义卷九 (894)

三命指迷赋

《三命指迷赋》提要 (905)

三命指迷赋 (906)



皇极经世书解卷六

观物内篇之五 七节

善化天下者止于尽道而已，善教天下者止于尽德而已，善劝天下者止于尽功而已，善率天下者止于尽力而已。以道德功力为化者乃谓之皇矣，以道德功力为教者乃谓之帝矣，以道德功力为劝者乃谓之王矣，以道德功力为率者乃谓之伯矣。以化教劝率为道者乃谓之《易》矣，以化教劝率为德者乃谓之《书》矣，以化教劝率为功者乃谓之《诗》矣，以化教劝率为力者乃谓之《春秋》矣；此四者天地始则始焉，天地终则终焉，始终随乎天地者也。

邵氏伯温曰：化教劝率、道德功力，皇帝王伯之事也。时异则人异，人异则事异，故不同。如此，皇、帝、王、伯时也，《易》、《书》、《诗》、《春秋》经也，天时、圣经相为表里，皆相因而成也。

黄氏畿曰：止者止于至善之谓。

愚按：此篇言观古今也。承前篇皇帝王伯、道德功力、化教劝率，归到圣人之经。圣经之垂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故与天地始终。天地始终即下文古今之谓也。

夫古今者在天地之间，犹旦暮也。以今观今则谓之今矣，以后观今则今亦谓之古矣，以今观古则谓之古矣，以古自观则古亦谓之今矣。是知古亦未必为古，今亦未必为今，皆自我而观之也。安知千古之前、万古之后，其人不自我而观之也？

邵氏伯温曰：有今故有古，有古故有今。古亦未必为古，今亦未必为今。皆自我而观之也。自我而观之者，观之以道也；以道观之，则何古今之有焉？无古无今，则古今犹旦暮之间也。圣人通乎昼夜之道而知，则能通古今；能通古今，则能通万世。故虽千古之前，万古之后，皆可以自我而观之也。

黄氏畿曰：以运经世，自尧甲辰迄宋英宗月仍在午辰方过已，旦暮何其速哉！以此为今，安知其不为后日之古？以彼为古，安知其不为前日之今？若今若古皆自我而观之，则千古之前、万古之后其道一而已矣。

愚按：此以古今一道起下文古今圣人天时圣经消长因革之义，于文只作中间一过，然古今犹旦暮一语，已包括元会运世三篇。而所谓观古观今自我而观之者，实此篇之正旨。盖于因革损益之中，合古今而观焉者也。

若然，则皇、帝、王、伯者圣人之时也，《易》、《书》、《诗》、《春秋》者圣人之经也。时有消长，经有因革。时有消长，否泰尽之矣。经有因革，损益尽之矣。否泰

尽而体用分,损益尽而心迹判。体与用分,心以迹判,圣人之事业于是乎备矣。

邵氏伯温曰:天时、圣经不异,惟圣人为能知时作经,以为民疾。时有消长,故有否泰;经有因革,故有损益。时有否泰之异,故体用于是乎分;事有损益之异,故心迹于是乎判。圣人之事业在乎体用心迹之间。盖体用心迹之间有权与变存焉。知权与变,然后能尽体用心迹。体用心迹一也,因时而有所分判。然未尝分判也,卒归乎一而已矣。

黄氏畿曰:若然,谓观之以道也,圣人之事业备,谓备于体用心迹之间。

愚按:此承明首节之意,以圣人之时圣人之经并言。然惟时有消长,是以经有因革。否泰犹治乱之谓,损益即损益可知之义。不必因偶合卦名,遂牵入卦体。如黄氏之说反失正意。否泰尽数句一气而下,盖时有消长。阳长阴消则泰,阴长阳消则否。圣人有所以处否泰者焉。经有因革。因中有因则益,因中有革则损,圣人有所以为损益者焉。体用心迹亦遥承前篇之意。就否泰损益言之,否泰体也,所以转否为泰者用也。损益迹也,所以因时损益者心也。体即迹,用即心,合体用心迹而圣人之事业于是备焉。然有消长否泰,乃有因革损益,故下文以因革损益言之,而意重在孔子。

所以自古当世之君天下者,其命有四焉:一曰正命,二曰受命,三曰改命,四曰摄命。正命者,因而因者也;受命者,因而革者也;改命者,革而因者也;摄命者,革而革者也。因而因者,长而长者也,因而革者,长而消者也;革而因者,消而长者也;革而革者,消而消者也;革而革者,一世之事业也;革而因者,十世之事业也;因而革者,百世之事业也;因而因者,千世之事业也;可以因则因、可以革则革者,万世之事业也。一世之事业者,非五伯之道而何?十世之事业者,非三王之道而何?百世之事业者,非五帝之道而何?千世之事业者,非三皇之道而何?万世之事业者,非仲尼之道而何?是知皇帝王伯者,命世之谓也。仲尼者,不世之谓也。

邵氏伯温曰:正命,天命之也。受命,人授之也。人授之者受之于人也。如《书》所谓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是也。改命者,有所改革。如《易》所谓汤武革命是也。其事虽不同,皆天也。摄命者,以臣行君之事者也。此明皇帝王伯之事也。因而因,则无为而已。因而革,舜循尧道而有所变,以随时也。革而因者,武王伐商乃反商政,政由旧是也。革而革者,时变之极,则一切变矣。长而长为春,长而消为夏,消而长为秋,消而消为冬。时之消长其变如此。伯以力服人;以力服人者,止于其身,故其事业一世而已。王者以功及民;以功及民者,其效远。故其事业可以至于十世。帝以德教民;以德教民者,得其心,渐民也深,故其事业可以至于百世。皇以道化民;道能久,故其事业可以至于千世。可因则因,可革则革,通万世而无弊者,孔子之事业也。故孟子谓生民以来未有夫子也。命世谓得位而在上者也,不世谓不得位而在下者也;虽不得位而在下,其道实出帝王之上而能用乎皇帝王伯者也,故孟子谓孔子集大成也。



愚按：此言因革之事，而归之孔子。君天下者受命不同，故肖长因革因时而变，已包括六篇以下各史事在内。有因革则有事业，事业不必皆出之圣人，皇帝王伯各有之。而久近不同，惟仲尼可以万世。命世犹孟子名世之意，不世者不可以世计也。邵伯子以得位不得位言，未是。

仲尼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夫如是，则何止千百世而已哉？亿千万世皆可得而知之也。

邵氏伯温曰：商周革命者也，而亦有所因。故商因于夏礼，周因于商礼。禹汤武王皆圣人也，其道则同，不得不因；其时则异，不得不革。故皆有所损益。惟圣人不苟同，亦不苟异，与时偕行，知所损益，以一世而知万世。故虽亿千万年皆可得而知之，何止于百世可知而已？所以可得而知之者，以理故也。

黄氏畿曰：仲尼，道出帝王之上，而能用乎皇帝王伯者，故引其言。邵子一元吟有曰：“中间三千年，迄今之陈迹，治乱与兴衰，著见于方策，吾能一贯之，皆如身所历。”所以贯者，吾心之知也。又《诗》曰：皇帝、王伯、父子、君臣四者之道理限于秦，至秦而三代之礼不得行矣。然所因者，人之大伦。损益不过制度文为而已。伯一变至于王，王一变至于帝，其道可知，固非秦所能限也。

愚按：此言损益之道，亦以孔子之言为断，以因革损益包消长否泰，而以百世可知包一世十世千世万世。曰亿千万世可知，又归重仲尼之不世也。

人皆知仲尼之为仲尼，而不知仲尼之所以为仲尼。不欲知仲尼之所以为仲尼则已，如其必欲知仲尼之所以为仲尼，则舍天地将奚之焉？人皆知天地之为天地，而不知天地之所以为天地。不欲知天地之所以为天地则已，如其必欲知天地之所以为天地，则舍动静将奚之焉？

邵氏伯温曰：仲尼之道不异天地。欲知仲尼，观天地则知仲尼矣。天地之道不过动静而已，欲知天地，观动静则知天地矣。然天地何尝有心于动静哉？盖时焉而已矣。仲尼之不异天地亦时焉而已矣，故孟子谓孔子“圣之时者”也。

黄氏畿曰：自皇帝王伯而归于仲尼，皇极之统也，亦犹自八卦四象而归于太极尔。然必自天地动静言者，天地即太极之全体，动列即太极之妙用。

夫一动一静者，天地互妙者欤？夫一动一静之间者，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欤？是故知仲尼之所以能尽三才之道者，谓其行无辙迹也。故有言曰：“予欲无言”，又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其斯之谓欤！

朱子曰：康节言一动一静者，天地之妙也。一动一静之间者，天地人之至妙也。盖天只是动，地只是静，到得人便兼动静，是妙于天地处。故曰人者天地之心。论人之形虽只是器，言其运用处却是道理。

邵氏伯温曰：一动一静者，天地之妙用也；一动一静之间者，天地人之妙用也。阳辟而为动，阴阖而为静，所谓一动一静者也，不役乎动，不滞乎静。非动非静而主乎动静者，一动一静之间者也。自静而观动，自动而观静，则有所谓动静。方静而

动，方动而静，不拘于动静，则非动非静者也，《易》曰复其见天地之心乎！天地之心盖于动静之间有以见之，圣人之心即天地之心也，亦于此而见之。退藏于密，则以此洗心焉。吉凶与民同患，则以此斋戒。夫所谓密、所谓斋戒者，其在动静之间乎！此天地之至妙至妙者也。圣人作《易》盖本于此。然动静之间，间不容发，岂有间乎？惟其无间，所以为动静之间也。

黄氏畿曰：动中有静，静中有动，妙于动静者也。而其一者常存，岂非至妙之谓欤？图左为阳天，辰不见于震，故去一用三，自复一动而阳生至于乾。图右为阴地，火常潜于巽，存一用四，自始一静而阴生至于坤。一动一静之间，乃坤末复初，静极几发，而人心与天地之几相应。邵子诗曰：“何者谓之几？天根理极微”。得意难言正，在于此。上言至妙者，一以言天地而未言人心也；下言至妙者，二则人之至妙有得于天地者也。然惟仲尼尽之。其曰“行无辙迹”，非动而无动之谓乎？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非静而无静之谓乎？曰“予欲无言”，则心为太极，又兼乎动静之间矣。妙之又妙，非仲尼何足以及此？

愚按：此明天地之所以为天地，而谓孔子与天地同此，所以旷观古今未有如孔子也。一动一静之间，即坤复之间。外篇之二云：无极之前阴含阳也，有象之后得分阴也。与周子所言太极不必尽同然。外篇之一云：心为太极，又曰道为太极，与周子亦不必尽异。朱子以天地分动静，以人兼动静为妙于天地处，似与邵子微别；末以孔子行无辙迹拟天之“时”行而“物生”。黄氏以“行无辙迹”“时”行“物”生分属动静迹通。

观物内篇之六 十一节

孔子赞《易》自羲轩而下，序《书》自尧舜而下，删《诗》自文武而下，修《春秋》自桓文而下。自羲轩而下，祖三皇也。自尧舜而下，宗五帝也。自文武而下，子三王也。自桓文而下，孙五伯也。祖三皇，尚贤也。尚五帝，亦尚贤也。三皇尚贤以道，五帝尚贤以德。子三王，尚亲也。孙五伯，亦尚亲也。三王尚亲以功，五伯尚亲以力。呜呼！时之既往亿千万年，时之未来亦亿千万年，仲尼中间生而为人，何祖宗之寡而子孙之多耶！所以重赞尧舜，至禹则曰“吾无间然矣”。

邵氏伯温曰：《易》、《书》、《诗》、《春秋》皇帝王伯，圣人之事业尽在于是矣。仲尼祖三皇，宗五帝，子三王，孙五伯，其道大德尊如此。《中庸》曰：圣人祖述尧舜，而不曰三皇，尊之而不可以名言也。宪章文武而不及五伯，卑之而有所不足道也。此则兼举之矣。孙五伯可谓卑之矣，然圣人作《春秋》虽五伯犹或取之，以其有功于一时也。故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圣人之心公天也如此。三皇、五帝之治皆尚贤者也，而三皇以道，五帝以德。三王、五伯之治皆尚亲者也，而三王以功，五伯以力。道德则无亲疏之间，功力则有从违



之异。然以力率天下而亲之则狭矣。此皇帝王伯之所以分也。时之既往,时之未来,皆有亿万之数,所以为古今也。仲尼在古今之间,何祖宗之寡、子孙之多?谓治世少而乱世多,圣君少而庸君多也。三王方三皇五帝时虽不同然,固已鲜矣。后世不止杂乎伯,而伯亦有所不足也。仲尼赞尧则曰“惟天为大,惟尧则之”;赞舜则曰:“君哉舜也!无为而治者,其舜也欤!”至禹则曰“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敝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至文王则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谓至德也已矣!”至汤武则曰“顺乎天而应乎人”。呜呼!文王之德与舜禹并,可谓至矣。

黄氏畿曰:贤贤之道行,则必尊所尊。是故祖三皇以尊其道,宗五帝以尊其德。亲亲之道行,亦必贤其贤。是故子三王以贤其功,孙五伯以贤其力。呜呼发叹,其感古慨今者深矣!故以运经世,尧舜当乾之大有,夏禹八年则入姤之乾。仲尼赞尧既曰“惟天为大,惟尧则之”,而又述其“咨舜,允执其中”。赞舜既曰“君哉舜也”,而又美其继尧无为而治,岂非圣人在天子之位而逢时运之隆乎?至禹则但曰“吾无间”,然三王可称者莫若禹,且不得与于重赞之,数他可知矣。盖运至于姤,一阴生而世道降,文王虽有至德,犹服事殷;仲尼亦不有天下,此固自然之数也。

愚按:此亦历观古今,论各代兴亡之由。而先言孔子赞修删定之事,明已修经世书之所来也。但前篇于历代浑言之,此则历举春秋时王侯及战国秦汉以后之君,叙述间以议论,盖圣经之后,继以诸史为下三篇。张本上篇之九云:《易》始于三皇,《书》始于五帝,《诗》始于三王,《春秋》始于五伯,即四句之意。尚贤谓贤之也,尚亲谓亲之也,旧说未是。祖宗子孙之云由《中庸》“祖述”字生出,盖论道统非论宗系也。黄氏谓孔子既从周,自不敢子厥先王,亦过为曲说矣。曰“时之既往亿千万年,时之未来亦亿千万年”,明其为观古今之意。时有古今,皇帝不再出,而贤君亦间作,故曰“祖宗寡而子孙多”。下重赞尧舜,而于禹不无轩輊,正应上意。邵伯子之解未允。

仲尼后禹千五百余年,今之后仲尼又千五百余年。虽不敢比仲尼止赞尧舜禹,岂不敢比孟子上赞仲尼乎?人谓仲尼惜乎无土,吾独以为不然。独夫以百亩为土,大夫以百里为土,诸侯以四境为土,天子以九州为土,仲尼以万世为土。若然,则孟子言自生民以来未有如孔子也,斯亦未为之过矣。

黄氏上赞尧舜下无“禹”字。

邵氏伯温曰:仲尼后禹千五百余年,今之后仲尼又千五百余年。盖道之相传无古今之异,仲尼传尧舜禹者也,孟子传仲尼者也,吾先君子盖学孔孟者也。一夫之土百亩而已,大夫之土百里而已,诸侯之土四境而已,天子之土九州而已,皆有穷极者矣,仲尼之道通万世而无弊,万世之所尊者也。故曰仲尼以万世为土,非特万世也,亘古今、穷天地一人而已。故孟子曰“自生民以来未有如夫子也”。

愚按:仲尼赞尧舜禹,今亦愿学孔子,正见经世之作所以法《春秋》之经也。经



世书上自尧舜，下及五代，则孔子所赞当兼尧舜禹，言之虽皆赞词，而不必无所轩轻矣。古本为是。自禹以后至邵子时三千余年，即元会运世三篇所叙之年也。黄氏每以运世言之，是已。无土，《白虎通》曰：“圣人无土不王，使舜不遭尧，当如夫子老于阙里也。”

夫人不能自富，必待天与其富，然后能富。人不能自贵，必待天与其贵，然后能贵。若然，则富贵在天也，不在人也。有求而得之者，有求而不得者矣，是系乎天者也。功德在人也，不在天也，可修而得之。不修则不得，是非系乎天也，系乎人者也。夫人之能求而得富贵者，求其可得者也；非其可得者，非所以能求之也。昧者不知，求而得之，则谓其已之能得也，故矜之；求而失之，则谓其人之不与也，故怨之。如知其已之所以能得，人之所以能与，则天下安有不知量之人耶？天下至富也，天子至贵也，岂可妄意求而得之也？虽曰天命，亦未始不由积功累行。圣君艰难以成之，庸君暴虐以坏之，是天欤？是人欤？是知人作之咎固难逃已，天降之灾，禳之奚益积功累行？君子常分非有求而然也，有求而然者，所谓利乎仁者也。君子安有余事于其间哉？然而有幸有不幸者，始可能语命也已。

邵氏伯温曰：富贵在天不可求而得，功德在人所可修而至。不可求而得，故必曰有命；所可修而至，故不可不勉。世之人不务修其所可至，而务求其所不可得惑之甚也！故未得之，则患得之；既得之则患失之。得之则矜夸，失之则怨怼，苟能知己得之人与之皆天也。如是，则安有不知量之人哉？圣人之大宝曰位，天实命之，故尧命舜“天之历数在尔躬”，舜亦以此命禹，天位岂容求而得者？不可求而得，况可以不道而取之耶？此戒乱臣贼子，使之知天命之可畏也。积功累行，人之所当为，君子岂有求而然？然必自积功累行以得之。不积功累行以得之者，或有之矣，终亦必亡而已。积功累行而不得者，亦有之矣，君子乃谓之命也已。

黄氏畿曰：富贵承上有土而言，功德承上五帝三王而言。先概方求富贵而不修功德者，后乃明言富有天下贵为天子由于积功累行以立命。此下乃以经世三千余年事言之。

愚按：先言富贵在天，“天下至富”以下言至富至贵由积功累行，尤非可妄求，反覆警醒，至因有所求而积功累行一层更极深切。此节总领下数节意，直贯至篇末。

夏禹以功有天下，夏桀以虐失天下。殷汤以功有天下，殷纣以虐失天下。周武以功有天下，周幽以虐失天下。三者虽时不同，其成败之形一也。平王东迁，无功以复王业；赧王西走，无虐以丧王室。威令不逮一小国诸侯，仰存于五伯而已。此又奚足道哉！但时无真王者出焉，虽有虚名，与杞宋其谁曰少异？是时也，《春秋》之作不亦宜乎？

邵氏伯温曰：夏禹、商汤、周武，其功德在人深矣，其创法垂统至矣，后世子孙虽中才之君能保惜其基业，谨守其法度，兢兢业业而勿失，虽百世可也。夏则太康已失邦，而其后有桀。商太甲已不明，而其后有纣。周昭王已南征不返，而其后有幽、

厉。《诗》云：“赫赫宗周，褒姒灭之”，盖周至幽、厉，虽曰未亡，其实亡矣。独以文武之泽未斩，国之典型尚存，故至赧王而后失之。其祖宗艰难积累以得之，其后亡国败家之人庸愚暴虐以失之，若出一涂。《书》曰：“为善不同，同归于治；为恶不同，同归于乱”，此之谓也。平王东迁，文武之业尽矣，故无功以复王室；赧王西走，危亡之势极矣，故无虐以丧王室。皆不足道也。当是时也，天下无王矣，孔子之作《春秋》，所以明王道而存王者之礼法也。

黄氏畿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盖君德以阳刚为主，臣道以阴柔为辅。有天命以得天下，虽时不同，皆由阳刚中正仁而积功；人作咎而天降灾以失天下，虽时不同，皆由阳刚过亢，不仁而肆虐。成败之形则一而已。此总言三代得天下与失天下之由。东迁而后，运入姤中，巽以消之，变其阳刚，化为阴柔。既不能明作以有功，亦不能披猖而为虐，反赖五伯以推亡固存；君不逮臣，阴道盛长，可谓验矣，王降而伯，此《春秋》所以作也。

愚按：外篇之九云：平王名虽王，实不及一小国之诸侯。齐晋虽侯，而实僭王。此《春秋》之名实也。与此意同。

仲尼修经周平王之时，《书》终于晋文侯，《诗》列为《王国风》，《春秋》始于鲁隐公，《易》终于未济卦。予非知仲尼者，学为仲尼者也。

邵氏伯温曰：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周平王之时，王者之迹熄矣，故《春秋》之所以作也。《书》终于文侯之命周之东迁晋郑焉。依文侯犹知尊周，有功于时，故圣人取之。始于《典谟》，终之以文侯之命与《秦誓》，则其时其事可知之矣。王者之迹熄而《雅》、《颂》不作，周室之微不绝如线，四郊之外皆非已有，与一小国亦何以异？所存独王者之虚名耳。故黍离之诗列于《国风》也。《春秋》始于鲁隐。鲁，周公之国，周公之礼乐典章具在于鲁。至隐公之世，周公之业衰矣，此《春秋》之所以始隐又当周平之时也。《易》终于未济卦，一治一乱而未始有穷也。

黄氏畿曰：《书》终文侯之命，功由臣建。《诗》列为《王国风》，劝与臣同。《春秋》始鲁隐公，政以臣纪。王者之迹其熄至此，圣人于是寓其意于《易》之未济卦。夫六十四卦至未济而尽，固也文王后天离易乾，坎易坤，以为天地之用，使有圣人者出焉。开天辟地，为人立极，则羲轩造化，廓然一新。乾坤交泰于坎离，自有天人相与为无穷者，固贞下起元之理也。圣人四府先《春秋》而后《易》，其即昊天四府之冬而后春者欤？故仲尼修经为经世之所取法也。

愚按：鲁隐元年即平王四十九年。言仲尼修《春秋》仍兼《易》、《书》、《诗》、言之，与首节起句相应；曰学为仲尼者也明。谓经世之作志在《春秋》，以申明次节之意，非但论列历代作史断已也，故以下接言春秋之事。

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而出自诸侯，天子之重去矣。宗周之功德自文武出。而出自幽、厉，文武之基息矣。由是戎得以侮中国，周之诸侯非一，独晋能攘去戎狄，

徒王东都洛邑，用存王国，为天下伯者之倡，拒鬯主瓚之锡，其能免乎？《传》称子贡欲鲁告朔之饩羊，孔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是知名存实亡者犹愈于名实俱亡者矣。礼虽废而羊存，则后世安知不有复行礼者矣？晋文公尊王虽用虚名，犹能力使天下诸侯知有周天子，而不敢以兵加之也。及晋之衰也，楚由是敢灭周，斯爱礼之言信不诬矣。

邵氏伯温曰：礼乐征伐，威福之大柄也。臣下得而擅之，则人君之权移于下矣。盖由君非其君，臣非其臣，欲不乱其可得乎？周之幽、厉，小人而乘君子之器者也，盗思夺之矣。故犬戎得以侮中国，晋文侯独能攘戎狄而迁周于洛，知有君臣之义，未同于夷狄，其功亦可尚矣。此《书》所以有文侯之命也。孔子之时，鲁国告朔之礼废已久矣，而饩羊犹存。子贡见其徒有虚名故欲去之，圣人用心深远，谓礼虽废而羊犹存，后世安知不有因其羊而行礼、循其名而求其实者乎？岂不愈于羊礼俱废、名实皆亡者也？故晋文公有尊王之名而尚能有功一时，所以圣人亦取之也。

黄氏畿曰：此下言《春秋》始终、五伯功罪，以见为国以力不若以礼之愈也。礼乐征伐皆天子之权，而礼为大；道德功力皆天时之变，而力为下。大权出于诸侯，功德息于幽、厉，独晋捍王于艰，为五人倡，中国犹有礼义之师焉。告朔事之实也，饩羊名之虚也，尊王名之虚也，息兵事之实也，文侯之后文公继伯虽曰尚力，然天下诸侯尚知有君臣之礼。及晋分为韩、魏、赵，而后秦敢灭周，是晋之名足以制夫秦之实也。盖周衰五伯实有功于天下，晋为之始。晋衰五伯已削迹于天下，周为之终。

愚按：以下论春秋时之王侯，此与上节皆言平王然。上节言周而此节则言晋也。前言晋文侯，后言晋文公。文侯在平王时，文公在襄王时，相距一百二十余年。以文侯为伯者之倡，邵子之特见也。饩羊存礼，外篇之九云：子贡欲去告朔之羊。羊，名也。礼，实也。名存而实亡，犹愈于名实俱亡。苟存其名，安知后世无王者作是以有所待也？意与此同。但外篇为平王时言，此为文公时言，微异。

齐景公尝一日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是时也，诸侯僭天子，陪臣执国命，禄去公室，政出私门，景公不能上奉周天子，欲其上奉已，不亦难乎？厥后齐祚卒为田氏所移，夫齐之有田氏者，亦犹晋之有三家也，亦犹周之有五伯也。韩、赵、魏之于晋也，既立其功，又分其地，既卑其主，又专其国。田氏之于齐也，既得其禄，又专其政，既杀其君，又移其祚。其如天下之事岂无渐乎？履霜之戒宁不思乎？

邵氏伯温曰：君臣父子，天下之达道，人之大伦。所以维持天下者，以此用之则治，舍之则乱。古今一也。周之衰，三纲五常绝矣；篡君弑父无所不至，以君臣父子之道不明故也。诸侯既僭天子矣，大夫安得不僭诸侯？大夫既僭诸侯矣，陪臣安得不僭大夫？其甚则鲁之三家以雍彻用八佾舞于庭，是以陪臣僭天子也。陪臣而僭天子，况于执国命乎？始于僭逾，卒于攘夺，势必然也。故田氏之于齐，韩、赵、魏之



于晋，终逐其君而盗其国。向命名齐、晋之君不敢僭周，则所谓田氏与三大夫者其敢逐其君而盗其国乎？《易》曰：“履霜，坚冰至。”君子方履霜之时，固已知坚冰之必至，宜辨之早也。

黄氏畿曰：告朔饩羊以名实言，君臣父子以名分言。礼之兴废系乎名实。一事之微，圣人犹致其意。礼之有无，系乎名分三纲之大，岂徒言哉？夫惟一事之不慎，履霜之不戒也。其极也，君臣易位而三纲沦斲，坚冰凝矣。春秋之世非徒秦晋为然，则圣人之伤悯不既深乎？

《传》称：王者往也，能往天下者可以王也。周之衰也，诸侯不朝天子久矣。及楚预中国会盟，仲尼始进爵为子，其僭王也不亦陋乎？夫以力胜人者，人亦以力胜之。吴尝破越而有轻楚之心，及其破楚又有骄齐之志，贪婪攻取不顾德义，侵侮齐晋，专以战伐为事，遂复为越所灭。楚又不监之，其后复为秦所灭。秦又不监之，其后复为汉所灭。恃强凌弱，与虎豹何以异乎？非所以谓之中国礼义之师也。宋之为国也，爵高而力卑者乎？盟不度德，会不量力，区区与诸侯并驱中原，耻居其后，其于伯也不亦难乎？

邵氏伯温曰：楚，蛮夷之国。《春秋》、《书》曰楚子而僭王，僭之甚者也。吴、楚、秦、越皆蛮夷之国，恃强凌弱，不顾德义，方之齐晋有间矣。宋襄公亦尝主盟，而衰弱无术，不足道也。

黄氏畿曰：周无天王之实，而楚有僭王之名，《春秋》于中国会盟书楚为子者，以礼正其僭也。既论楚复及吴者，楚之僭王在春秋之始，吴之僭王在春秋之终。其所尚者皆以力不以德，故吴灭于越，越灭于楚，楚灭于秦，秦灭于汉。此以见力之不足恃也。然力非君子之所尚。若德不足以服人，则亦济之以力。宋襄公尝主盟会，为楚执辱，卒无刷耻之道，故五伯惟称齐晋秦楚，而宋不与焉矣。

愚按：此先言王之不能王，并及楚之僭王，吴、越、楚、秦之皆以尚力而灭，后言宋襄公伯之不成伯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大略具于此三节中矣。

周之同姓诸侯而克永世者，独有燕在焉。燕处北陆之地，去中原特远，苟不随韩、赵、魏、齐、楚较利刃，争虚名，则足以养德待时，观诸侯之变。秦虽虎狼，亦未易加害。延十五六年后，天下事未可知也。

邵氏伯温曰：燕居朔方，固为强大，与齐、赵相抗。苟不与诸国争胜负，而修召公之政以治其国，有可以兴王之理也。而乃遣一刺客以入暴秦，自取灭亡，可哀也已。

黄氏畿曰：前言春秋之始终，此率战国之始终。春秋之始终，仲尼有望于晋，而齐次之，若宋则非所望也。故邵子之论详晋齐，略秦楚，而宋则无取焉。战国之始终，仲尼不及见矣。邵子先致望于北陆之燕，而后绝望于中原之秦。时当伯降，王者不兴，其伤悯之意，正所以学仲尼也。天之人际，邵子之言备矣。此又兼论地势欤？

愚按：战国七雄之时，惟燕为周之同姓。伤悯衰周，望燕振起，此先儒所未言及者亦，邵子之特见也。

中原之地凡九千里，古不加多而今不加少，然而有祚长祚短、地大地小者，攻守异故也。自三代以降，汉唐为盛，秦界于周汉之间矣。秦始盛于穆公，中于孝公，终于始皇。起于西夷迁于岐山，徙于咸阳，兵黠宇内，血流天下，并吞四海，更革今古。虽不能比德三代，非晋隋可同年而语也。其祚之不永，得非用法太酷，杀人之多乎？所以仲尼序《书》终于《秦誓》一事，其指不亦远乎？

邵氏伯温曰：秦穆公能改过自誓，伯之优者也。故序《书》上自《典谟》，下及《秦誓》，圣人犹取之而不废，是亦“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之义也。王者不作，近于王道者虽一善必录。圣人之心如此，然终于《秦誓》则世之盛衰、道之污隆可知之矣。穆公有此一善可称，宜乎国以强盛。其后，始皇并吞海内，而乃尚刑好杀，止于二世以取灭亡。盖秦虎狼之国，尚刑好杀乃其所习，又况本以商鞅之法，其貽谋惨刻少恩有自来矣。

黄氏畿曰：仲尼序《书》以《秦誓》终之，固知继周者之必秦矣。善守者不必善攻，善攻者不必善守。其势异而其事殊故也。始皇不仁，黠武血刃，善攻者也。及六王既一，则无所用其攻矣。更革古今，又不求所以善守之道，故其地大方晋隋则有余，而其祚短方汉唐则不足。一阴日积，否不复休，仲尼之见远矣哉。

愚按：此两节论断语可作部《战国策》总论。

夫好生者生之徒也，好杀者死之徒也。周之好生也以义，汉之好生也亦以义。秦之好杀也以利，楚之好杀也亦以利。周之好生也以义，而汉且不及。秦之好杀也以利，而楚又过之。天之道、人之情又奚择于周、秦、汉、楚哉？择乎善恶而已！是知善也者无敌于天下，而天下共善之。恶也者亦无敌于天下。而天下亦共恶之。天之道、人之情又奚择于周、秦、汉、楚哉？择于善恶而已。

邵氏伯温曰：仁者好生，不仁者好杀。好生者王，好杀者亡。好生者天佑之，人爱之；好杀者天怒之，人恶之。周、汉以好生而兴，秦楚以好杀而废。天之兴废、人之去就，在乎仁与不仁而已。

黄氏畿曰：朱氏隐老曰：自春秋战国至于楚汉，兴废世变极矣。要其归则善恶之分、义利之判而已。孟子言善者无敌于天下，邵子以善恶无敌相对而言，非与孟子之言相反也，秦楚虽皆无敌于天下，而不得如周汉之兴，盖天道福善而祸恶，人情好善而恶恶。善者好生，即生之徒也，安得不兴？恶者好杀，即死之徒也，安得不灭？以人之情揆天之道，知其无择于周、秦、汉、楚，惟以善恶分、好恶判兴亡而已。愚谓阳为德主生，阴为刑主杀，已会以前皇降而帝莫不尚德，午会以后王降而伯莫不尚刑。然天人有相胜之理，治乱有可易之道，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孟子曰：“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夫，善得于心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仁义行而王者兴矣。”天地大运否易而泰，其几在此。邵子此篇所以拳拳于人事欤？

愚按：归于义利善恶之分，总结通篇之意，不曰仁而曰义者，前节云有求而然者利乎仁者也，积德非有所求则仁，即其义矣较常解更进一层。



皇极经世书解卷七

观物内篇之七 七节

昔者孔子语尧舜则曰“垂衣裳而天下治”，语汤武则曰“顺乎天而应乎人”，斯言可以该古今帝王受命之理也。尧禅舜以德，舜禅禹以功，以德帝也，以功亦帝也，然而德下一等则入于功矣。汤伐桀以放，武伐纣以杀，以放王也，以杀亦王也，然而放下一等则入于杀矣。是知时有消长，事有因革，前圣后圣，非出于一途哉。

邵氏伯温曰：尧舜禅让，汤武征伐，其事则异，其道则同。以德以功，以放以杀，时之消长，事之因革不同，如此至于征伐放杀，非圣人之所欲，盖有不得已者焉。圣人所同者心，所异者迹。苟姑同乎迹而不同乎心，则为奸为恶，何所不至？不可不辨也。然所谓下一等者，孔子序《书》赞尧舜禹亦有详略，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圣人盖有深意焉。

黄氏畿曰：尧舜之禅，汤武之伐，其事若有德刑之异，而其心在生民则同。盖阳非阴不能成岁，功德非刑不能除民害。随时制事，岂可执中而无权哉？尧舜当乾，其时则长，其事则因，其心俟后圣而不惑；汤武当姤，其时则消，其事则革，其心考前圣而不谬。不然，则新莽、魏丕法尧禅舜，肆为奸恶，何所不至？故不可不辨也。朱氏隐老曰：垂衣裳而天下治，则无所事于干戈矣。顺乎天而应乎人，则虽有事于干戈，而上衣下裳无倒置之理也。不然，则上违天命，下拂人情，何以曰顺乎天而应呼人哉？禅也，伐也，又有功德之分，有放杀之分焉：亦一分而二、二分而四之意。

愚按：此与下二篇亦历观古今而尚论其事，皆经世三篇之意。先儒所谓“如《易》之有系辞”者也。其以尧舜汤武并论，又以尧与纣并论，以舜与傅说并论，以伊尹周公并论，以三王尚行、五伯尚言并论，乃归到义利之分，与前篇末节同意。未由尚言尚行而言，尽之于心，言愈进而意愈切矣。此节以德以功承四篇道德功力而言也，消长因革承五篇时有消长、经有因革而言也。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易》系辞：“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易》革卦象。

天与人相为表里。天有阴阳，人有邪正。邪正之由，秒乎上之所好也。上好德则民用正，上好佞则民用邪。邪之由有自来矣。虽圣君在上不能无小人，是难其为小人。虽庸君在上不能无君子，是难其为君子。自古圣君之盛未有如唐尧之世，君子何其多耶！时非无小人也，是难其为小人也，故君子多也，所以虽有四凶，不能肆其恶。自古庸君之盛未有如殷纣之世，小人何其多耶！时非无君子也，是难其为君子，故小人多也，所以虽有三仁，不能遂其善。是知君择臣、臣拜君者是系乎人也，



君得臣、臣得君者是非系乎人也，系乎天者也。

邵氏伯温曰：天与人常相须而成者也。君子小人相为盛衰，犹阴阳之相为消长。圣人之于《易》，否泰言之详矣。且治世非无小人也，乱世非无君子也。君子在内，小人在外，所以为泰而天下治矣。君子在外，小人在内，所以为否而天下乱矣。所谓内外者，不独在位在野而已，但信而任之则为内，疏而远之则为外。上好正而信任君子，则小人远矣，不必待屏绝诛窜而后为外也。上好邪而信任小人，则君子远矣，不必待斥逐放弃而后为外也。所谓小人者，圣人亦未尝疾之已甚也。但使君子在上，小人在下，各得其所而已。君子在上则足以制小人，小人在下则顺以从君子，如是则天下未有不治者也。若夫疾恶而不能去，去恶而无其术者，适所以致祸乱之道也。呜呼！君子小人用与不用，实系上之所好；上之所好实系天下治乱。可不慎哉！

黄氏畿曰：上好德而民用正，其犹乾之多阳乎？上好佞则民用邪，其犹坤之多阴乎？圣君在上不能无小人，犹乾之多阳不能无阴；庸君在上不能无君子，犹坤之多阴不能无阳。自古圣君无如尧之世，君子何其多耶！此人事也。若以天道观之，乾卦三十六阳何其多耶？时非无阴也，十二阴难乎其托于三十六阳矣。故阴之少乃所以成其为阳之多也。虽有四凶，不能肆其恶，岂非十二阴不能变其为乾者耶？自古庸君无如纣之世，小人何其多耶？此人事也。若以天道观之，坤卦三十六阴何其多耶？时非无阳也，十二阳难乎其托于三十六阴矣。故阳之少乃所以成其为阴之多也。虽有三仁，不能遂其善，岂非十二阳不能变其为坤者耶？虽系乎人也，未尝不系乎天也。

贤愚人之本性，利害人之常情。虞舜陶于河滨，传说筑于岩下，天下皆知其贤而百执事不为之举者，利害使之然也。吁！利害从于中而矛戟森于外，又安知有虞舜之圣而传说之贤哉？河滨非禅位之所，岩下非求相之方，昔也在亿万人之下，而今也在亿万人之上，相去一何远之甚也！然而必此云者，贵有名者也。

邵氏伯温曰：唐尧之举舜，高宗之用说，盖有素矣。犹历试诸艰，稽之梦卜，所以厌天下之心也。虽舜之圣，说之贤，苟为利害所蔽，人亦安知其圣贤哉？故尧高宗不得不如此，贵乎有名也。

黄氏畿曰：百执事莫之举，非无知人之明也，特以举之之利不无举之之害，利害业于中，将欲与之而意不能以无夺；矛戟森于外，将欲进之而意不能以无退。然而利害之私终不足以掩公。论有圣贤之实者，必有圣贤之名。名之盛者，实必茂焉，孰得而蔽之？

愚按：尧举舜见《书·尧典》，高宗用传说见《书·说命》，舜耕历山，陶河滨，见《史记·舜本纪》，而舜与说并言又本《孟子》“舜发犬畝中，说举版筑间”语也。

《易》曰：坎。有孚维心。亨行有尚。中正行险，往且有功，虽危无咎，能自信故也。伊尹以之，是知古之人患名过实者有之矣。其间有幸与不幸者，虽圣人人力有